



在实践中反思， 在反思中实践。

■ 陈清侨

“文化研究”的香港经验 ——香港岭南大学陈清侨教授访谈

邹 赞，林子敏

摘 要：陈清侨教授是文化研究在香港的重要推动者和践行者，他在访谈中详细追溯了文化研究在香港的发生、发展及现状。岭南大学作为亚际文化研究的重镇之一，在文化研究机制化与社会介入两方面作出了有效尝试，这种“香港经验”可以归纳为：首先，处理好文化研究的课程建设、学位授予和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和社会事件之间的关系，通过创设一个教育的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去处理教与学的问题，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会对文化研究的理解与发展带来新的贡献；其次，香港的社会体制和历史情境都很独特，因此在开展具体的文化研究实践之前，不能照搬任何既定模式，包括伯明翰学派的命题，必须认真评估在地情境，尤其是香港回归前后的历史语境。最后，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十分注重课程改革，在课程设计中贯彻“在地”(local)与“全球”(global)的交汇和联通，倡议通过不同的公共渠道和方式，走出课堂，介入社会，思考生活，推动文化践行在社会历史面向的落实和应用。

关键词：文化研究；机制化；介入；在地性；香港经验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3)09-0001-06

陈清侨，岭南大学文学院学术事务长，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系主任，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副主任，亚洲洲际文化研究联合会督导委员会委员，国际文化研究学会执委（国际文化研究学会代表亚洲地区的监事）。1978年毕业于香港大学，主修中文及比较文学，1981年获比较文学哲学硕士学位，随后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文学系深造，198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加入位于司徒拔道的岭南学院英文及翻译系，其后转往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建立跨院校“香港文化研究计划”，并主编“香港文化研究丛书”（1995-2000）。1998年重返岭南通识教育学院，1999年策划“文化研究文学士”课程，于2000-2003年间担任首届系主任，2003年策划“文化研究硕士”课程。研究专长包括文学与文化批评、电影研究、文化政策、教育与文化研究等。合著《盘点IH·认真通识》（2009）、《否想香港：历史、文化、未来》（1997）等；合编《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2008）、Hong Kong Connections: Transnational Imagination in Action Cinema（2005）、《身份认同与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论文集》（1997）等。目前担任Cultural Studies、Inter-Asian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传播与社会》等学术期刊编辑及顾问委员。陈清侨教授还积极投入学院之外的文化发展与文化教育工作，曾任民间联网组织“文化传承监察”及“西九龙民间评审联席会议”召集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高等教育界代表（2007-2010）、香港艺术发展局委员兼艺术评论组主席（2008-2010）。现为李兆基香港创意书院顾问、独立智库“公共专业联盟”创会会员、公民党创会会员（2006-）兼社会及小区发展政策支部主席等。2011年起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

收稿日期 2013-05-15

基金项目 新疆大学2012博士启动基金“重估‘文化’的位置——英国文化主义研究”（批准号BS120221）

作者简介 邹赞（1979-），湖南衡阳人，北京大学博士，新疆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林子敏，香港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研究。

邹赞,林子敏(以下简称“邹、林”):陈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够约请您给大陆读者谈谈文化研究在香港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同时也分享一份文化研究的香港经验。在大陆学界,文化研究既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问题。从文化研究的全球播撒来看,中国大陆无疑处于其理论旅行的外围圈层,尽管人们常常把杰姆逊(F. Jameson)1985年在北大的学术演讲视为文化研究(严格说来,应该算作文化理论)传入的先声,但是文化研究真正引起大陆学界重视、继而掀起一股热潮应当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2000年前后的文化理论译介热更是将这股学术思潮推至高峰。文化研究在大陆的兴起与发展主要得益于内外两种冲动力:一是文艺理论界在热衷于接受当代西方文论的过程中“发现”了文化研究,而这一颇具社会实践意义的跨学科思潮为学界应对精英文学衰落、大众文化兴起的现实情境提供了有效的话语资源;一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社会文化的急剧转型,人文精神大讨论、消费文化议题突显、全球化与身份认同、中产阶级崛起等一系列因素呼唤一种新的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范式,这种缘自内部的冲动力恰恰呼应着对于文化研究的需求。在文化研究传入中国大陆的过程中,港台流行文化无疑充当着有效的催化剂,香港的文化研究在时间上可能要早于大陆,那么,文化研究在香港兴起的具体社会情境是什么,它主要是基于英美文化理论的强势输入,亦或是香港本地社会语境的一种主动呼应?

陈清侨(以下简称“陈”):你们提出的问题是关于香港文化研究发生的经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F. Jameson的影响不是很大,文化研究也根本不当F. Jameson为文化研究。在此之前,Eric Ma^①和陈锦荣^②都曾撰文谈论香港文化研究,并曾访问过我。两位的文章都能作参考。但正式谈论香港文化研究发生的中文文献则较少。

关于这个话题,首先要追溯到当时香港的社会状况,文化研究进入香港,在时间上要早于大陆。倘若从文学研究的范畴考量,F. Jameson应当是一位代表性人物,但是在1980年代末期(我也刚刚回来教书),并不存在某一位特定的理论家,那时候的社会学和传播学专业的教授与老师们不会把F. Jameson的位置抬得那

么高。一般来说,学者们接受后结构主义理论、福柯、符号学、政治经济学理论,视域是相当宽泛的。理论界的左翼和前卫思想,在香港学界都有一点影响,但与中国大陆那种焦点式的影响相比较,香港的影响就显得不是那么大了,并且不会过度的集中,呈现出一种撒播的态势。学院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我在英文系,Eric Ma在传播学、陈锦荣还没有回到香港、罗永生^③在社会学、许宝强^④在翻译系等,还有一些人正在读书、攻读学位,整个是一种非常散的状况。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叫“文化研究”的特别名堂,只是不同的理论在聚集发酵。从事文学批评的那一部分力量,包括我在内,比较注重符号学,雷蒙德·威廉姆斯的东西读得也比较多,威廉姆斯本身就是文学批评家,我对威廉姆斯的接触和认识是从《马克思主义与文学》(The Marxism and Literature)开始的,当时在书店看到这本书,于是买了来读,也不知道这就是叫文化研究的,后来才知道威廉姆斯是文化研究的先驱人物。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做文学研究的人,就不会那么早认识和了解雷蒙德·威廉姆斯的理论。当然,威廉姆斯身处一个大的思潮当中,但由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关系,威廉姆斯与文化研究紧密勾连在一起。面对当时传入的新思潮,香港的学术体制并没有开办系统化的文化研究课程。1980年代末,香港的学术思潮比较开放自由,但是聚焦不够,学者们面对着正在发酵中的较为新颖的左翼思潮或后结构主义理论时,开始有选择地对之加以吸收利用。

邹、林:您原本是研习比较文学的,后来缘何转向做文化研究?

陈:这正是我要谈的香港文化研究发生的第二部分,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博士毕业后回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讲授比较文学,由此开展我的学术道路。在一个慢慢自学的过程中,我逐渐累积理论资源,并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影响和塑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兴趣。我本人在学术道路上属于那种很典型的,从来没有研究过香港,也未曾有意识地阅读和关注这方面的资料。当然读过一些香港小说,但不是作为课程要求去读。我所接受的理论,加上香港的现实状况,促使我将学术理论的焦点偏向香港,开始写一些相关文章、展开一些研究。此外,我希望在自己讲授的课程里

①马杰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其研究方向为文化身份认同、媒体与文化变迁、社会与文化理论等;其近期研究方向为媒体的再现与身份认同、跨境移民的政治研究、都市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等。

②陈锦荣,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现任系主任及教授。

③罗永生,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④许宝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融入一些香港元素,也希望我带的研究生(当时是比较文学,加一点文化研究,与香港大学类似)做一些关于香港的题目,譬如,我的硕士生开始研究许冠杰,这样的论题在当时还没有人讨论,他们可以说是最早尝试的一批人。后来,我的学生也开始以陈宝珠为研究对象,这对他们而言都是新鲜的题目。也有同学做香港的儿童文学,但做的不是香港自身的儿童文学,而是香港的儿童文学如何受到西方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等等。其实,这都是我当时所指导的学生,你可以看到,许冠杰是当代的流行文化,陈宝珠是过去的、即有关于流行文化的历史的,而儿童文学是较少人去做做的题目,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的情况是这样。

还有,我在教学中开始做两件事,一件事是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中开设了一门有关香港的课程,名称是 Made in Hong Kong(“香港制造”),这是我第一次教通识教育课程,采用的是以中文授课的大班课堂,听课学生来自于本地的不同系科。除此之外,还用英语为交换生开了一门有关香港的课程。我有一群教学助理,有一些是本系的研究生,也有别系的教学助理帮忙(当时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丰富),包括后来的卢思晴、叶荫聪^①等,我当时可以说是边学习边准备教学资料,摸着石头过河。做这些课题,觉得有需要,就继续坚持做。在一边教学一边做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并遭遇了很多困难,譬如材料整理、批评实践等各方面都相当欠缺。现实境况使得我们更加有必要、更加系统地去发展这一方面的研究,或在广义上讨论关于香港的文化、香港文化的发展等重要议题。这就是我自己的策略。我相信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肯定会有不同的关注点,但是具体状况都是类似的。学者们开始在各自学科的范畴当中触及香港的问题,虽然社会学涉入这个领域的时间会早一些、讨论也相对深入一些,但学科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早期的香港及作为战后30年的香港,有关香港的课题很少被纳入大学专门课程或学术范畴。但与此同时,香港的文化发展蓬勃,其中的落差也很显著,这跟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联。

接下来要谈的是另一个重要背景,我是1986年回港的,当时已有关于香港过渡的讨论。自1990年代

初以来,已经有对于1997的关注,虽然在政治上有一些已经过了,但是,这种关注开始在社会、民生、家庭中产生诸多影响。在香港,越是临近1997,回归问题越被热炒,很多流行的东西随之繁衍。在1993-1994年期间,我获得政府资助,展开一项名为“香港文化研究”的计划,这是一个较早期的、较大规模的跨院校计划(仍以中文大学作为基地)。当然,计划中有一些是关于文学的,所谓的文学史,就是将一些文学史料及作品整理出版,小思^②和黄继持^③老师都参与了这个计划。除此以外,还涉及一些比较当代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议题,罗永生就参加了这方面的项目。这是一个系列研究计划,也曾初步出版了一些刊物作品,包括我所编的由牛津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约十几本,都是这套计划的相关成果。但这些都是很粗浅的东西,因为都是很初步的对于香港的探讨。

邹林:从学科建制的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964年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创建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英国为例,文化研究没有发轫于牛津、剑桥等处于中心地位的著名高校,却在十分边缘的伯明翰大学安营扎寨,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既有利维斯主义的幽灵在不断显影,同时也牵系着文化研究与工人阶级成人教育之间的紧密关联。香港的情况好像也很类似,享有盛名的文化研究机构最终不是建立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而是选择了相对边缘的岭南大学。作为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首任系主任,您作为当事人经历了其中的过程,那么,这主要是基于一种自觉的选择,还是各种特定因素耦合(articulate)的结果?

陈: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应当接续到上一个问题,我刚才提到,我们的那套研究计划总体看来并不是很成功,我后来之所以离开香港中文大学,也跟这件事有关系。主要的原因比较复杂,但简单来说,我想做的是一个具备可持续性的研究,在学术及课程的框架下能够持续发展。我当时虽然拥有一个平台、一个研究计划,但那是不能进入体制以内的。我在中大从事那项研究课题大概持续了三、四年的时间,但我发现这项计划不可能进入学院体制,有学术规范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因素是领导者对文化研究缺乏认识。

^①叶荫聪,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

^②卢玮銮教授(1939年-),笔名[小思]、[明川]、[卢骖],生于香港,籍贯广东番禺,香港近代著名散文作家、教育家。

^③黄继持(1938-2002)生于香港,祖籍广东中山。香港大学文学士、硕士。自1965年秋起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2000年夏退休,文艺评论结集有《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寄生草》、《追迹香港文学》(合着)。另编纂《鲁迅卷》等书多种。黄继持先生毕生从事文学教育及研究工作,著作涵涉中国现代文学、香港文学、文学理论、中国美学等多个范畴,亦透过创办文化刊物、担任文学奖评判等工作,推动香港的文化发展。参见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7007081005876>。

此外,在一套已经定型、具备固有学术规范的机制如中文系、英文系去发展新的学科,肯定会遇到重重困难,某些阶段的困难是无法克服同时也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决定离开。离开对于我而言,有两个意义:一是意味着转行,转行不是离开学术界,而是变换了专业(discipline)。因为我所读的专业一直是文学,不是文化研究,事实上也没有人是读文化研究的。从我回来教书开始到1997年,已经教学了十几年。因为早初两年是在司徒拔道的岭南大学^①,然后再到中文大学。不管是在哪个学校,我始终是在文学领域安身立命的。因此我很清楚,一旦决定离开,我就会离开文学这个领域,否则离开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时就是想赌一把。岭南大学给我提供了赌一把的机会,这样就有了岭南这个阶段。^②

邹,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跨学科、超学科甚至于反学科;文化研究的活力,正在于其不拘限于传统学科疆界的灵活的介入性。以北京大学为例,该校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开设了文化研究招生方向,核心课程就是戴锦华教授主持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以此为基础的大众文化和电影研究系列课程;社会学系也开设了一门文化研究课。很多人都在讨论文化研究是否一个学科的问题。现在,岭南已建立了一整套的体制,从本科到博士课程,这跟文化研究反建制的传统是否存在矛盾?

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如果我们过于在乎甚或纠缠于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在岭南这十年,一切都不会发生。其实,我也想过这些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思考过此类议题。但是,我想我当初是做了一个有风险性的决定(risky)。我不是全都知道,但我了解有一群人确实想做这样的学问(scholarship),如果没有资源,那一切都将是纸上谈兵。尽管在我离开之后,香港中文大学也开展了一门文化研究方面的课程,实际上是中大的文化与宗教系联手开办的,二者之间其实并无多大关联,中大的一些学者也在尝试文化研究,赢得了一定的名声,但是与岭南相比,则没有做得那么全面。只有岭南成立了文化研究系,实施了系列课程和研究计划。所以,你说得对,我们正在经历体制化的过程,而文化研

究本来是反体制的。我们也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

邹,林: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也在学院机制化方面做出过一些尝试:1995年,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率先成立“文化研究工作坊”,2004年,王晓明教授在上海大学成立文化研究系;北京、上海、南京的多所高校均拥有类似的文化研究机构。上述研究机构均偏重于学术科研,目前尚没有招收文化研究专业的本科生,即便是提供研究生学位,也只是作为招生方向挂靠于中国语言文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传统学科。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一方面寄予在体制之内,拥有成熟完备的课程体系和学位授予方式;另一方面又非常积极地介入当地的公共政策和社会事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协调的?

陈:我当时抱着赌一把的心态来到岭南,建立了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行,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研究计划,见步行步,摸着石头过河。但有一点我非常清楚,必须建立一个课程(program)规划,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无法累积人才和资源,也不可能推动文化研究事业。依靠零星的步伐是走不通的。其实,最早的文学士学位课程(BA)是从1999年开始的,2000年,正式成立文化研究系。我是1998年1月来到岭南的,从时间上算可以说很快就建立了系。当然,学校很支持。在文化研究系成立的前几年,我和Meaghan组织过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议题就是围绕体制化问题的,我在会上讨论的就是香港的经验,其他人则讨论别的议题。辗转了几年,现在陆续把文章写出来,已经到印刷阶段,年内应当可以出来。

我以前写的文章和最近的文章中都会涉猎有关“教育”与“教学”的问题,这不单是学科的问题,而是教育与教学的问题。教育是education,教学是pedagogy。教学不止是教学法,教学法只指上课用power point,用什么材料等。教学是作为一个捕捉的过程或者一种关系,所谓过程,指教与学都是一种过程,而关系则会牵涉到人与媒介,譬如我和你是一种教与学的关系,但其中不止是我和你,还会牵涉到一种媒介的存在,如文本(Texts)或电影等。教学就指向这三者之

^①香港岭南大学现校址为屯门虎地,青山公路岭南段,于1996年建成迁入;前校址位于司徒拔道15号。

^②陈清侨教授在《文化研究十年:一则岭南大学的香港故事》中这样回顾其开拓“文化研究”事业的心路历程,“1997年,香港纷乱激情的一年。年终,我抱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平静心情,离开任教了十年的香港中文大学……战战兢兢地从头去探求开拓文化研究教育事业的路。在那时,香港人一众都无不对周遭景象感到欢欣、迷茫、狂喜、失笑,感到希望的难得,痛恨绝望的常态。说实在的,真的没有几个人会特别开心或者觉得要严肃对待文化研究是哪一门学科。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几个人以一整年的难得平静的日子,闭门不问世事,筹备一个在此并无先例可援的文化研究学士学位专科课程”。参见罗永生主编:《文化研究与文化教育》,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联合出版,2010年,第7-8页。

间的关系及其互动。这样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我、Meaghan 和许宝强将教学与教育的问题拉回文化研究的议程(agenda)之中。我们亦曾撰文做此工作。事实上,威廉姆斯或伯明翰中心在起源上都是跟教育有关的,尽管当时并没有太多有关教学的讨论,但至少是谈论教育的。一方面是成人教育,早期很多文化研究的学说和理论都是从成人教育那里试验出来的,另一方面,伯明翰中心处于非常边缘化的位置,这与后期的岭南很相似,但不同的是伯明翰中心是一个 graduate center(研究生中心),因为它是 graduate level,所以研究的东西比较有弹性,人也少一些。伯明翰中心初期的声誉是由老师及研究生共同创造出来的。我们知道,伯明翰中心已经倒闭了,那就代表其不可能持续下去,尽管其影响力后来传到别的领域。香港的经验,特别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的经验,就在于创设一个教育的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去处理教(Teach)与学(Learn)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对文化研究的理解与发展会带来新的贡献。

这些新的元素的出现和存在,需要一套完整的体系。正如我所说的,当初80年代的处境,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系,如当初的吴俊雄在社会学系开文化研究课程,他一个人在从事这项工作,又能如何呢?你可能是一个好老师,但你的发展就被限制了。以岭南这样的格局,才能在教与学上有话可说。若不是这样,就只能继续在内容上作探讨,不能做别的。我不能说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你必需说文化研究是一门学科。当然,是存在一个 dilemma(进退两难)的,对别人及正在就读的学生,你要说得通这事情。但另一方面,你不要让文化研究的精神彻底地改变,虽然改变是在所难免的。某些东西是已经改变了,例如对教学的重视,这在以往是没有的。当你没有材料及批判性话语还没有建立成为领域的时候,十几年之间是差别很大的。纵然诸多相关书籍陆续出版,但究竟体制化的发展对文化研究来说有何影响,就要看大家的评价了。我只能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样做的原因,以及在进行过程中所做的各种考虑。另外一点需要补充,稍稍翻阅我们出版的十周年纪念的书,可以了解到不同程度的学生,包括本科的、硕士的、研究人员的,他们将来的发展状况怎样。

邹林:据我们了解,在香港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大多具有欧美高校尤其是美国高校的学习经历,比方说,您是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获得了哲学博

士学位。这些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泛及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传媒与文化政策、都市研究等等。我们都知 道,文化研究在全球的巨大影响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理论界的推介效应,事实上,美国学界在文化研究的全球播撒中行使着分销商的职能,经过其包装与转换之后,英国文化研究的诸多激进命题被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时尚传媒等议题所置换,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批判性和激进性。文化研究在香港的学院机制化,应该与美国的情况有所区别,但也会嵌入某些影响因素。在这方面,岭南的文化研究硕士课程^①提供了颇为有益的尝试,请您介绍一下岭南的两年兼读制授课式文化研究硕士课程如何在注重文化消费维度的同时充分重视文化的生产维度,进而结合香港的特殊历史经验和地缘政治意义,成功建构起文化研究的在地性(locality)?

陈:海外文化研究的一些固有特性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些参照,但总体上说还是很模糊的。香港的社会体制和历史情境都很独特,这决定我们不能照搬任何既定模式,包括伯明翰学派的命题。我们不能套用任何现成理论来解决香港的问题。所以在开展具体的文化研究实践之前,很有必要认真评估在地情境。

我们一直在尝试课程方面的改革。从2003年开始,文化研究硕士课程属于自负盈亏。截止目前,招生人数与教研支出已经达成平衡,并且还能给系里提供一定的资源去发展其他方面。因硕士所接触的学生不一样,相对本科生而言,他们在社会上已取得了不同层面的影响。说实话,文化研究硕士课程的社会效益较大,因为硕士同学年龄较大,有较强的自我选择性,对选读文化研究也是有要求的。文化研究硕士课程是一个关键,虽然不容易,但置身于一个学系之中是能够完成的。我们面临的下一个十年的挑战是: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迁及小格局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等等,有效抵抗住学系的种种压力,尽量保持这种课程本身的特色,在已有的建制上,在各项目的运行之中,做到文化研究课程的可持续发展。要推进和改善这一计划,需要有一定的危机意识,即聚焦本地的可持续发展,竭力保持当年的活力以延续已经获得的社会效果。将来究竟会如何,需要借助于上述各因素的合力作用。

我们容许大家在不同范畴和议题中摸索,在“教”与“学”的探研过程中去掌握“文化研究”的实验。再以

^①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硕士课程简介上这样介绍,“‘文化研究硕士’(MCS)课程增进学员当代文化研究理论及实践知识,学习从批判角度重新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文化、社会、政治范畴的互动和转化。本课程特别适合从事传媒、文化创意、教育、艺术及文化管理、社区工作等行业的人士修读”。

更多的日子去证明,以自身的践行去回应,知识和文化的掌握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掌握了以后,什么事可为?什么不可为?对自己来说它意义何在?对于别人它又有何价值?文化研究走的,只能是“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实践”的长远道路。理论的应用和理想的传达,正体现在于用者——落实到生活和文化中的每一反思。由于我们的文化研究团队大多曾经/正在参与不同的社区实践或文化、社会运动,并关注不同的现实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在地”(local)与“全球”(global)的交汇和联通,贯彻在课程的设计之中,更于此大前提下,倡议通过不同的公共渠道和方式,走到课堂以外,介入社会,思考生活,推动文化践行在社会历史面向的落实和应用。

邹林:随着文化研究的“全球旅行”,亚洲很多地区都在讨论文化研究。如何看待文化研究在各地的发展?

陈:在亚洲各地区,文化研究的发展是有落差的。当然,对文化研究发展的相关讨论,可以作多层面的研究,许多方面的内容在文章上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比如,如何设计课程就是很重要的议题,本科课程与研究生的课程有一定的不同,因为本科课程面向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他们所攫取的社会经验也很不同,若你教他们批判理论,可能他们对要批判的对象并不十分清楚。那你应该教他们什么呢?这是很艰难的,只能在试验中慢慢改变。现在香港的大学改为四年制,在课程上也做了相当大的改动。

邹林:作为“另一种”文化研究的可能^①,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n Cultural Studies)成为亚洲地区文化研究学者的一种智识互动和思想交流,鉴于香港的独特地缘政治位置和特定的历史原因,身份认同一直是香港文化研究的重要命题,1997年香港回归、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等一系列参数促使香港的文化研究学者不断地深入思考身份问题,香港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如何有效接合殖民记忆、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境之间的复杂张力,这已经成为香港文化研究参考文献

- [1] 罗永生.文化研究与文化教育[M].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联合出版,2010.
- [2] 孙晓忠.方法与个案——文化研究演讲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 [3] 王晓明,陈清侨.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M].

的核心命题。我们不妨以香港电影为切入口来谈谈身份认同问题:这两年的大陆影视界一个极具症候性的现象就是间谍片流行,一时间“谍影重重”、“风声四起”,以《潜伏》为代表的电视剧和以《风声》为代表的电影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新的历史语境下复杂的认同纠葛,国共关系的重新书写、中国大国姿态的银幕表征等等无不烙着时代的鲜明印记。间谍故事和卧底故事在情节设置方面有着又和之处,只是间谍故事的敌我对决往往触及到国家意识形态层面,而这恰恰成为战后香港电影审查制度的一个重要禁区,所以香港的间谍片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倒是卧底片成为了一种典型的香港电影类型。您怎样评估香港文化研究在亚际文化研究中充当的角色?

陈:我们正在推行亚际文化研究。我还没有来岭南之前,在1990年代,就已经与大陆及台湾学者建立了学术联系,比如戴锦华老师。我们这些人年龄相仿,希望在快退休的时间里,尝试能否达成共同合作、相互帮助,打通一些东西,让其再往前一步。亚际文化研究已经有十年的发展历史,几个华人地区,包括南亚、东南亚地区,也在积极地参与其中。事实上,跨地区合作是比较困难的,但也有一些较好的成果,如《亚际文化研究》期刊。期刊是一种学术平台、产品、游戏或者空间,但是这些都还不够。举办国际会议也显然过于简单。如何再作多方面的交流和合作,需要进一步探讨。在跨地区的亚际网络中,文化研究需要在内容、课程以及年轻学生的交流方面,以本地及地区性为本位精神基础,深入开展一些跨地域性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建立起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计划的活力,防止不同区域因安逸于自身现状与领域而逐渐失去力量。在学术发展的意义上说,亚际文化研究一直希望将本地的东西变成区域性的,当我们谈论香港的事情时,不止是说给香港人听,同样也要说给外面的人听。说起来容易,但实际操作上是困难的。在我看来,如何在教育上开拓新的空间,让北京、上海、台湾、香港、雅加达等地的学生有机会交流对话,这是一个新的议题。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 [4] 陈清侨.身份认同与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论文集[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 [5] 陈清侨.文化相像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阳玉平]

^①参见张春田,王颖:《“另一种”文化研究的可能:从亚际文化研究出发——墨美姬(Meaghan Morris)教授访谈》,载《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7年第3期。

学者聚焦

陈清侨，香港岭南大学
文学院学术事务长，岭南
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系
主任。研究方向：文学与
文化批评、电影研究、文
化政策、教育与文化研究
等。

